

1945~2005: 中国与伊朗外交关系考略

王 猛

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半叶, 中国和伊朗两国都基本实现了各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也都取得了显著的现代化成果。但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 中伊两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代际差距”。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 中国自 1949 年以来的发展经验为伊朗共和国的革命后社会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双边往来是实用主义超越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 必将在新世纪谱写出更辉煌的新丝绸之路篇章。

关键词: 中国 伊朗 现代化 北京共识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08)04-0051-07

作者简介: 王猛 (1971-) 男, 史学博士,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陕西西安 710069)。

1920 年, 中国和伊朗在罗马签订了《中波友好条约》, 规定两国互派大使、公使及代办等事項。虽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个, 也是中国和西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但条约本身只是一种友好见证, 当时的中伊两国彼此都着眼于内部事务及其与列强的关系而无暇发展双边往来¹。20 世纪 40 年代, 美国以中国主权与和平监护人的恩抚心态, 给予了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的外援, 帮助中国在二战结束时获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伊朗方面, 美国在二战期间鼓励巴列维国王摆脱“帝国主义”的条约和特许权, 无偿向伊朗提供了价值 4 150 万美元的食品和军火武器, 并派遣财经和军事顾问团帮助伊朗重建经济和军事力量^④。因此, 1942 年的中伊建交, 几乎不能看作是双方自主的国家行为, 更多只是同属盟国的一种象征。整体而言, 由于国内一直战乱不止, 国民政府与已建交的中东国家之间都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外交往来, 除了在联合国与各国代表有一些接触外, 其他的交往非常有限^④。1943 年 11 月蒋介石的开罗之行虽不是与中东国家的直接交往, 但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东的第一次访问, 而同等级别的第二次访问是 35 年之后的华国锋访问伊朗。

1949~1979 年的中国和伊朗互动

1949 年后, 中伊双边往来因两大阵营的对立开始变得陌生而困难, 意识形态差异和利益权重考虑成为双方发展关系时的主要障碍。巴列维伊朗担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中苏结盟, 担心中国对伊朗共产党的支持^{1/4}, 因而对中国的敌意持续增加: 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政权, 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决议并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支持敌视中国的“西藏提案”,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诬蔑中国侵略, 长期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1/2}。另一方面, 另起炉灶的中国外交在与中东国家的交往时自我设限, 以政党和意识形态划线, 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支

¹ ④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第 420、288~290 页。

④ 左文华、肖宪主编:《当代中东国际关系》,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 第 377 页。

^{1/4} Hashin S. H. Behbehani: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1955-1975* London p. 217.

^{1/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 第 147 页。

持中东国家下层民众的颠覆性革命运动。因此,虽然中国支持伊朗1951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1956年、1957年对伊朗水灾、地震的灾民进行过赠款救济,但中伊关系在50年代却始终没有改善的迹象,非官方的双边贸易额仅有250万美元¹。这种意识形态色彩下的外交对峙,其深刻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国和伊朗都只是地区性国家,彼此的势力触角和需求尚未构成外交决策中的重大考虑因素。

1963~1979年间的东西方冷战相对缓和,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伊两国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都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遏制苏联的威胁和维护自身安全,中国开始努力寻求与美欧等西方大国关系的缓和,寻求包括伊朗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同期的伊朗,既欲填补英国撤离海湾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又对具有浓厚军事同盟色彩的苏印接近深感不安,担心苏印对伊朗施加“钳形运动”^④。对苏联扩张的共同担忧和拓展各自国际空间的相似愿望,促使中伊双方迅速走近。伊朗从1965年开始不再反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67年首次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7亿人口与核力量的伟大国家,1969年宣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70年罗马尼亚总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公报中,也写上了“两国元首认为联合国应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句^⑤。1971年4月,先行来中国“探路”的阿什拉芙公主和法蒂玛公主受到了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门口欢迎万隆会议上认识的老朋友阿什拉芙公主,法蒂玛公主则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⑥。1971年8月16日,即尼克松的访华《公告》发表一个月后,中伊两国在伊斯兰堡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中国则表示支持伊朗“保卫国家资源的正义斗争”。

可见,只要始终坚持合理的利益诉求,不走极端和政治挂帅,中国在任何的相关地区都会找到适当的合作伙伴,中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重是任何相关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伊朗之所以从1964年开始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原子弹成功试爆的强大冲击以及停止支持伊朗亲苏政党的外交和解姿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伊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即使在巴列维王朝垮台前夕的1978年也得到加强。60年代中伊非官方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5288万美元,比50年代增长了20倍。以1971年双方的经贸额为基准(598万美元),1972、1973、1975、1978年分别增长了6、10、14、20倍。1973年以前的贸易主要由两国政府出面签订,以伊朗货币里亚尔结算。1974年之后,中国开始以欧佩克的价格用硬通货购买伊朗石油,1976、1977年的购买量分别是20万和30万桶^{1/2}。

1979 从棋子到棋手的转折

1979年以前的中国和伊朗,都只是东西方冷战棋盘上有分量的战略棋子角色,而凭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伊斯兰革命,两国都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角色转换。

在共和国前3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这种渐趋务实的自主外交政策,开创了一个堪与二战结束初期相媲美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必要而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

¹ 1/2 M oham ed B in Huw 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London, 2002, p.276 p. 158.

④ 余建华:《当代中伊关系与伊朗对华政策动因》,《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⑤ 陈辛仁:《鸿爪遗踪》,《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⑥ 华黎明:《28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世界知识》2007年第7期,第56页。

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¹。近代中国第一次成了新欧亚大陆政治舞台上公认的“地缘战略棋手”,成为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角色。

1979年前后,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推进现代化和抵御苏联扩张,不仅未能对非核心利益的伊朗政局变动及时做出回应,而且事实上以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介入了敏感时期的伊朗内政。因此,虽然中国赞扬伊斯兰革命是一次符合伊朗人民意愿的反帝运动,并迅速承认了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也在事后为1978年8月华国锋同志的德黑兰之行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表达了歉意^④,但由于新生的伊朗共和国对所有曾与巴列维政权关系密切的国家心存疑虑,作为访问巴列维伊朗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次不适当的访问被伊朗新政府视为对巴列维国王的某种支持,伊朗公众也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列维政权的“朋友”,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大街上到处可见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⑤中伊两国关系的相对冷淡状态一直持续到两伊战争后期的1984年,因为中国的严守中立、积极劝和立场以及伊朗在战争时期的艰难处境,中伊关系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冰释前嫌的具体标志就是1984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伊朗。

总体上看,虽然中伊两国都从1979年开始逐步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转变,但却明显使用(选择)了不同的实现手段。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估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逐步确立了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⑥。这种注重实在利益和进步的做法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GDP从1400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3.43万亿美元,年均经济增长高出世界均速6个百分点,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1.8%提高到5.5%,世界排名则从第15位升至第4位;对外贸易从206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位次从第32位攀升到第3位。中国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在为国际市场干活,生产了世界家电产品的1/3,服装产品的1/2,钢铁产品的1/3等,在简单制造业领域,中国已经担负起许多大宗商品供应者的角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工场)”^⑦。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却似乎在纠正巴列维王朝的弊端时矫枉过正:在调整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时步履蹒跚,在寻求社会正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上摇摆不定,而且从根本上看,宗教因素使它难以真正客观的对西方式文明成果进行取舍。“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问题的思想分歧而加剧”^⑧。因此,仔细考察伊斯兰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后就会发现,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伊朗现在只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⑨。

¹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5页。

^④ Peking Leader Apologizes for Official Visit to Shah, Arab News (Jeddah), 30 July 1979. in P. R. Kumaraswamy, ed.,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Influence, London, 1999, p. 119.

^⑤ 华黎明:《28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世界知识》2007年第7期。

^⑥ 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9页。

^⑦ 江涌:《中国与美国:谁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经营报》2005年10月8日。

^⑧ [美] J. L. 埃斯波西托著:《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⑨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in Raymond Hinnebusc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Foreign Policy of Middle East State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2, p. 283-284.

回归常态: 1979~1997的中伊交往

1979年以后的中国中东政策灵活而内容丰富。凭借广结善缘的全方位外交和在阿以冲突中的公正立场,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不仅全面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做到了相互支持,彼此借重。“六·四”风波后,中东国家不仅无一公开参与西方对中国的“谴责”和“制裁”,而且最早实现了双方领导人互访。1989年10月,伊朗外长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立场的理解,声援中国政府为恢复秩序和稳定所做的努力¹。

1979~1997年间,伊朗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和抵制外来影响的坚定立场,吻合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因而也在中国的全球战略框架里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成为中国在80年代抵制苏联南下意图和90年代反对美国霸权的重要合作伙伴。虽然90年代冷战背景的消失改变了中伊合作的部分战略基础,但中伊两国却在新的发展阶段找到了更坚实而广泛的合作领域。中伊双方借助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使得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双边关系成为了一种可贵的传统。它是“实用主义超越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无论是宗教方面还是世俗方面。商业利益,尤其是石油出口和武器交易决定着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从巴列维伊朗到霍梅尼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均是如此”^④。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武器销售,在1979年后即由政治性质的礼物赠送变成了国家间正常的商品贸易,在销售高峰期的1984~1987年间,82亿美元的军火销售额占了同期中国出口总额的7%,虽然这一比例到1996年已经低于1%^⑤,但早期的军火销售却为中国外贸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爆炸性增长提供了初始动力。伊朗在1982~1991年间共购买了中国38亿美元的军火,是中国在80年代的第二大武器买主^⑥。80年代的中伊军火贸易符合当时的地区形势和相关当事国的利益。从中国方面看,以军火援助有着共同反霸立场的伊朗,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维护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坐视不救则有损自身利益和形象。从伊朗方面来看,维护主权、政权的需要迫使它必须尽一切可能寻求军火供应,“伊朗门事件”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即使中国不作为,伊朗也一定会从其他途径寻找替代供给,区别也许只是代价的不同而已。

事实上,中伊之间的军事联系因为互补性不强而缺少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当伊朗因为美国的制裁和苏联的拒绝供应而处境孤立时,中伊之间的军事联系就比较紧密,而一旦伊朗的军火供应渠道增多,例如可以方便地从俄罗斯获取性能更佳的武器,中伊两国的军火贸易就急剧萎缩。在伊朗1991~1997年58亿美元的对外军火采购中,俄罗斯以31亿美元独占鳌头,而来自中国的数额萎缩至19亿美元^⑦。中伊90年代军事合作的政治动机明显多于经济考虑,合作过程一波三折,1995年中国推迟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时就明确要求美国更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而1996年达成的45亿美元武器供应协议也显然没有得到执行^⑧。对于中国终止与伊朗在建造核电站工程中的合作,伊朗华语台评论说:“时至今日,伊朗根本不接受这是由于技术原因所致的辩解,而是认为,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施加的压力,使得中国取消了伊朗从中国购买价值17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合同。”^⑧

¹ ① ② Mohamed Bin H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 164, p. 165, p. 169.

④ Michael Dillo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in Hannah Carter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Middle East's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London, 2004, p. 50.

⑤ Daniel Bynan, Roger Cliff, *China's Arms Sale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1999, p. 29.

⑥ Bate Gill, "Chinese Arms Exports to Iran", in P. R. Kumaraswamy, ed.,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Influence*, pp. 113, 119.

⑧ 伊朗华语台:《发展伊中关系的潜力与障碍》, 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wenhua/cnir.htm 32K, 1998-1-2.

这一时期的中伊石油贸易基本上是双边关系中的副产品, 中国进口伊朗原油主要是为了平衡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首先, 中国本身并不需要从伊朗进口石油, 因为中国不仅长期是世界第五大产油国, 而且在 1993 年以前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其次, 在中伊建交后的 1971~ 1996 年间, 伊朗仅在 1972、1973 和 1982 年三年是出超, 其余年份全是入超^①, 长期的贸易失衡如果得不到补救必然会影响双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再一个原因就是石油收入一直是伊朗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伊朗要抵消欠付中国的军火款项就只能出口石油。事实上, 中国在 90 年代进口伊朗石油与中伊之间的军火贸易, 无论在时间还是数量上都有着较高的关联度。因为冷战后中国与伊朗的几次大额军火贸易主要集中于 1994~ 1996 年, 1995 年 3 月双方达成的武器销售协议价值 16 亿美元, 所以同期伊朗对中国的出口额也一路攀升, 分别是 2.27 亿、3.86 亿和 5.36 亿美元, 石油出口从 1995 年的 95.12 万吨急遽提高到 1996 年的 231.11 万吨, 增幅达 148.2%^②。1997 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了 10 亿美元大关。从长远看, 中伊之间的石油关联正在从副产品变成主打产品, 而且有望成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强大动力。

1997~ 2004 常态参与的跨越式发展

1997 年是中伊关系发展的转折点, 随后三年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平台期。政治上, 中国在 1997 年 3 月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 日益重视地区性和全球性多边组织, 重视机制的参与及相关规则的制定^③。在 1997 年前后, 中国几乎与所有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伙伴关系, 设立军备控制与裁军司, 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正式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颁布《核出口管制条例》与《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理条例》, 对核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 执行与桑戈委员会“触发清单”相同的《核出口管制清单》^④。经济上, 已初步建立市场经济的中国渴求更大的国际空间, 中美之间不对等的贸易依赖制约了中国在发展与伊朗关系时的主动性。更重要的是,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持续低迷的国际油市掩盖了中国石油供需矛盾的严峻性, 恶化了伊朗的经济态势, 发展双边关系的经济动力匮乏。1997~ 1999 连续三年双边贸易额的徘徊不前就是这一时期中伊关系发展状况的一个侧影。

1999 年的“炸馆”事件表明, 通过自我矮化和自我贬损式的利益牺牲并不能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 中国此后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显然没有以前乐观, 开始平衡对外战略格局中的着力点。就中伊关系而言, 90 年代末以来, 双方经贸关系明显增长, 1999~ 2001 年的双边贸易额分别是 13.48 亿、24.87 亿、33.1 亿美元。数十家中国公司参加了地铁、油气等一大批伊朗建设工程, 其中的德黑兰地铁工程被视为双边经贸合作的典范。2001 年, 伊朗是中国在西亚地区新签承包劳务合同最多的国家, 合同金额达 3.40 亿美元, 也是在西亚地区完成营业额最多的国家, 达 2.15 亿美元。在伊朗 90 年代的两个五年发展计划中, 中国政府共向伊朗提供了 17 亿美元信贷, 是为伊朗提供信贷最多的国家。“9·11”事件, 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 中伊双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找到了双边合作的坚实基础, 从而彻底结束了 1997 年以来中伊关系的徘徊迷局。1998 年到 2003 年间, 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量的 13.6%, 年进口增长率为 16.5%, 均排列第二位。中国和伊朗 2002~ 2005 年的双边贸易额分别是 37 亿、50 亿、70 亿、100 亿美元^⑤。2004 年, 中伊悄悄达成

^① Mohamed Bin H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 1999* London, 2002, p. 276

^② 徐小杰:《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第 126 页。

^③ 唐世平:《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主要因素》, 张蕴岭主编:《未来 10~ 15 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环境》,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第 59~ 60 页。

^④ 夏立平:《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安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600~ 613 页。

^⑤ 中伊 2006、2007 年的双边贸易是 144.46 亿和 205.46 亿美元。

了多项能源合作协议: 3月, 珠海振戎公司与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签署为期 25年的框架协议, 计划从 2008年起每年从伊朗进口 250万吨液化天然气, 2013年以后的进口量将增至每年 500万吨; 5月, 中石油与伊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约, 从伊朗进口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 并同时获得伊朗相关石油区块的开发权; 10月, 根据两国政府签署的石油合作谅解备忘录, 伊朗同意中石化集团作为主要开发商开发伊朗亚德瓦兰油田, 而中石化将在今后 25年之内每年购买 1 000万吨伊朗液化天然气, 合同总价值近千亿美元, 几乎是中伊两国 2003年贸易额的 20倍¹。

虽然自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就一直是伊朗在寻找新经济和政治伙伴时锁定的目标之一, 但因为顾虑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 甚至还取消了已经签署的某些协议。1999年“炸馆”事件的强烈刺激和中国经济入世后对石油进口的渴求, 迫使中国在与伊朗合作时减少了对美国的顾虑。而另一方面, 通过积极的多边石油外交, 伊朗已经成功地把自已的利益和欧盟、日本、印度的能源需求捆绑在一起, 用石油利益促使一些国家在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牵制美国, 中国再不加入将会面临在伊朗石油市场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 2004年的中伊双方都很主动: 2月, 两国的混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4月, 伊朗举办了一个中国产品博览会, 向伊朗及周边国家介绍中国产品; 7月, 作为博鳌论坛在中东的唯一成员国, 伊朗把论坛的能源分会开到了德黑兰; 10月, 伊朗公开表示要给予中国最大的优先权, 希望中国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地; 11月, 中国外长李肇星访问伊朗, 宣布中国政府反对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伊朗合作的同时, 中国的能源战略依然坚持多元化路线以分散风险, 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长达 25年的天然气巨额协议, 伊朗也始终只是中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

应该看到, 中伊能源合作本质上是双方利益权衡后的理性抉择, 是国家之间的正常合作, 彼此都把对方当作了可靠但并非唯一的合作伙伴。对中国而言,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 都没有必要放弃伊朗这一巨大的能源来源, 问题只在于如何进行合作。不愿冒风险就只有准备失去利益, 但冒风险并不意味着坐等着风险变成灾难, 而是要逐步去化解风险。

2005 中国之路的伊朗含义

自 1979年以来, 中国的革命后社会进程逐步常态化和现代化: 国家身份认同从革命性向现状性转换、战略文化结构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过渡、安全利益重心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移位, 总体上“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④。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 中国经验为伊朗自 1979年以来的革命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对于伊朗日渐明显的“向东看”战略, 从必然的角度看, 这是伊朗政府在革命后纠偏与改革的表现之一; 从或然的角度看, 它说明了中国经验在东方国家应对内外危机时的普世意义。

伊朗社会对待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没有异议, 在争吵中模仿了中国以点带面、借助外力的渐进式方案。从 1993年的基什岛自由经济实验区开始, 伊朗先后开辟了 6个工商业自由贸易特区和 23个经济特区, 仅西阿塞拜疆省就有 7个边境市场。对进入贸易和经济特区的投资人, 伊朗不但免征 15年的所得税和进出口关税, 而且制定专门的保护外商投资法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 伊朗也期望借助外来的制度性动力来推动既有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和发展, 提高伊朗在国际领域的经济实力并促进经济繁荣, 加之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的示范效应, 伊朗从 1996~ 2005年

¹ 2006年 12月, 中石化与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签署了为期 25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 中石化每年从伊朗购买 300万吨液化天然气, 购价依照原油价格计算。因为中国已经和伊朗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签订了 100多个长期的大型合作项目, 一旦中伊签署的亚达瓦兰油田、南帕斯气田等开发项目真正付诸实施, 中国就是伊朗油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④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 1期。

共向世贸组织递交了 22 次入世申请,并在 2005 年 5 月成为世贸组织的观察员国。

2005 年的伊朗政治发展处于转折关头。保守派相继控制了议会、地方和中央行政权力。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有限扶持处于颓势的改革派,希望引导两派势力形成某种平衡以保持政局稳定。失去众多改革派盟友支持的哈塔米总统选择以退却来保持现政权的伊斯兰特性,宣称社会动荡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伊朗向民主进军必须行进在伊斯兰道路上。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在的伊朗需要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和一个更具威权的政治领导人或领导精英集团,来纠偏伊斯兰共和国延续了 1/4 世纪的航向而不至于引起动乱、并将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但却并非假问题。

从宏观面看,伊朗地缘战略位置比较适中,既没小到被忽略也没有大到让别国担忧以至于恶意外对立,只要保持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伊朗应该有一条相对宽松的发展之路。但事实上,革命初期伊朗新政府有些矫枉过正,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漠视并人为地拒绝客观存在的历史继承性,既过分妖魔化美国也刻意贬低了巴列维时期的社会成就,从而有意无意为自己设置了许多的发展障碍和交往障碍。革命激情下的伊朗因处置不当的人质问题而自陷不义之地,更因与美国的全面对峙而遭受了数十年的孤立与遏制,所丧失的不仅是可能从美国获得的各种援助,还包含正常而必需的发展空间。因此,伊美关系的好坏是伊朗能否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是伊朗国家战略的重点目标之一。从伊朗的国家利益角度看,与实现伊美关系正常化所需要的勇气和时机相比,和解的基础以及方式就显得次要多了。

资治通鉴,见古知今。如果从中国在 20 世纪的社会发展视角解读同期伊朗的社会发展,则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找准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没有人能够否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但伊朗的确不具备挑战整个国际秩序的实力和能力,伊朗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其次,历史发展具有很大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伊朗今天的现状既是既有体系背景的一种历史必然延续,也是发展转折关头的又一次酝酿,伊朗要在山重水复之际实现柳暗花明,关键就是看谁能够为伊朗做出类似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贡献。

余 论

中伊两国的往来始于公元前 119 年,唐、元、明时期达到高潮,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使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保障,而且使欧洲和远东的易货贸易不致中断。近代以来的中伊两国却因同时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而彼此疏远了,双方真正独立自主的交往始于 20 世纪后半期。有赖于适当的空间距离和建交时间,中伊双方都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对方,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中伊交往中始终至少有一方坚持利益至上原则,双边交往也因之在很多情况下避免了意识形态化,都把对方当作寻求利益最大化时的一种选择,都把寻求各自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当作合作的出发点,也都在合作中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取得了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的收获。更重要的是,因为中伊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且都是亚洲地区大国,都把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动和谐作为各自的追求目标,因而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诸多方面有着一致或相似的立场,存在着加强和巩固双边合作的适当基础。这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常态模式基础上的双边往来,它反映了中伊两国革命后社会政治进程的逐步成熟:双方不仅都对合作时的收获感到满意,而且没有、也不会因为合作关系的中止或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伊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各自在融入全球经济、推进新国际政治秩序建设时的一个平台,双方应该能够共同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丝绸之路篇章。

责任编辑:苏 成

Responsibility, Value and Path of Government in Providing Public Goods in Transitional Age

Wang Yilin(5)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public goods. Combining the matter of Chinese transition, it gives an answer about the endophytism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n providing public goods, and explains its current and latent effects on the applying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 core of public action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should be providing more public goods to promote the liberal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n the context of Marxism.

Key words transition; public good; liberal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lteration of Financing Capital's Use from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an Xiaoling Zhang Hongjun (14)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1290 announcements of 530 listed companies about the alteration of financing capital during 2000-2006,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at the present time,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and alteration of a capital-raising project are quite arbitrary,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raised are possessed by associated parties or left unused, and some investments are deceptive. The paper also makes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limited sample size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 st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lteration of financing capital's use from a listed company and its assets, meanwhil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its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net assets gain.

Key words listed company; capital-raising; alteration of financing capital's use; financial disclosure

Strategic Think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ltay Prefecture in Xinjiang Zhang Handong(19)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ality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ltay's developmen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next few years we should do a better job in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put advantage resources transform stratagem into practice with great effort,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central task, increasing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the averag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s their aim then, "Strengthening the Prefecture with industry, promoting development with investment, giving priority to project, attracting large enterprises and supporting the strong ones" as key point, "Setting up city in Beilun, settling the herdsmen and deep processing in mining" as breakthrough point, pay every effort to foster and strengthen advantageous industry, practically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y to realize rapid and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ltay Prefecture.

Key words strategic thinking; three breakthrough points; strategic measure

Centenary Review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ran from 1905 to 2005 Wang Meng(51)

Abstract China and Iran have realized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and achieved great modernizational fruit in the age of ROC and Pahlavi dynast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a and Iran has been appearing generation gap since 1949. As a relative successful model of social-development, Beijing Consensus will provide Iran with a good example of social-development after revolution. The increasingly deepening Sino-Iran relations, which are good examples of the triumph of pragmatism over ideology, will make a more splendid Silk Road in this century.

Key words China; Iran; modernization; Beijing Consensus